

上海与“重写文学史”之发生

◎ 杨庆祥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内容提要:

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联袂在《上海文论》上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正式提出了“重写文学史”这一学术“口号”。本文试图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重新探讨“重写文学史”的“发生史”,认为目前对于“重写文学史”发生的追认多集中于学科内部,而忽视了其作为历史文化思潮的属性,试图把“发生史”从学科化的线性时间叙事中“剥离”出来,重置于80年代的历史文化空间。在这个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讨论上海作为特殊的文化地理空间,其禀赋的左翼文化传统和消费文化传统在8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被“激活”,从而对“重写文学史”的发生、形塑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关键词:

重写文学史、上海、空间

一

在90年代的一篇文章¹中,陈思和详细回顾了1988年上海“重写文学史”的发生史:

“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并不是随意想象的结果,近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确实走到了这一步。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这门学科的发展轨迹。“文革”前的17年且不去谈,自1978年到1985年,这门学科的主要工作是资料的发现、整理以及重新评价。这在当时标志了一场重要的学术革命。……

由于这种问题的存在,1985年现代文学研究有了明显突破。其标志是那一年5月在北京万寿寺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的青年学者“创新座谈会”。那一年正是文艺理论界掀起“方法论”热的时候,其波及学术领域,启发了一些研究者在更广阔的视野范围内思考如何对现代文学作新的整合,以期改变过去那种对象过于狭隘而造成的局限。……会议以后,思想转化为具体成果,有北京大学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三人提出的“20世纪文学”的概念,在上海,有王晓明关于“20世纪作家文化心理局限”的研究,陈思和关于“中国新文学整体

观”的论述以及李劫等人从语言本体角度对新文学史作出重新梳理，等等。……

因此，我以为“重写文学史”只是前阶段学术研究发展而来的一个必然会发生的小环节，它的目的，用北京一位同行的话说就是“消肿”，使前一时期或者更早些的时期中，出于种种非文学观点而被搞得膨胀了的现代文学史作一次审美意义上的“拨乱反正”，这对于前一次在政治意义上的拨乱反正，应是一个新的层次上的反复。

很明显，陈思和的这种“讲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时间性”叙述，这里面的三个关键时间分别是1978年、1985年、1988年，其对应的“故事”分别是“80年代初的重评”、“20世纪中国文学”

（还包括“新文学整体观”等）、上海的“重写文学史”，在这样一种历史叙述中，上海的“重写文学史”被理所当然地理解为“学术场”内的“知识生产活动”，而与产生这种“知识”的社会历史环境不发生具体的联系，“重写”被理解为一种“自足的”、“独立的”、“纯粹的”学科活动。毫无疑问，这种历史的叙述自有其合理性，不过让我感到怀疑的是，这种叙述是否遮蔽了更复杂的内容？我发现，正是在同一篇文章中，似乎还有另外一种声音：

这些年轻的学者，几乎没有人是单纯地为学术而研究的，他们都是从实难中挣扎出来，带着“文革”留在肉体上和心灵上的伤痕，把眼睛盯住了属于他们经验以外的方面。他们如饥似渴地探求一切新的知识、新的学说，企图用新的理论信念来平衡他们已经失去了原有理论支持的心理，他们通过文学史的回顾和反省，企图悟出一条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老是演出悲剧的道理来。而在这个时候的现代文学学科，他们感到特别亲近……唯有现代文学领域，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为这批学者提供了一片任意驰骋的处女地。²

从这一段话我们似乎可以揣测出“重写文

学史”的另一种发生背景，那就是一代知识分子借助文学研究来表达其人文理念和社会关怀，并对当代社会政治文化进行介入和参与，这其实是80年代学术的一种比较突出的特征³。如果我们结合“重写文学史”的重要参与者，《上海文论》编辑部主任、“重写文学史”专栏的责任编辑毛时安的说法，也许会看得更清楚一点，毛时安在接受笔者的采访的时候，非常详细地谈到了“重写文学史”发生的一些细节，为了讨论的需要，特摘录如下⁴：

我办《上海文论》，首先我是非常关注《上海文论》对现实的介入。在某种意义上说呢，我们和57年那批“右派”有异曲同工之处，就是强调这个介入、强调干预，那么也和萨特的“存在主义”相通，当时正好也是“存在主义”刚刚进入中国嘛。……

当时88年的上半年《新民晚报》发了一篇很小的文章，大概是三四月份还是四五月份，叫《苏联重评金星英雄》。我当时一看，就是苏联对文学开始重新评价，因为当时戈尔巴乔夫掌权嘛，对文学开始重新评价，他对他之前的赫鲁晓夫时代之前斯大林时代的很多声名很大的文学作品进行重新评价，其中就包括《金星英雄》。那么受到这个启发以后呢，当时就因为很年轻嘛，觉得做什么事情就一定要做好做大，就是一定要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和轰动效应，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对我们自己的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进行重新评价。那么当时呢，还受到尼采价值重估的思潮的影响，我就把这个想法跟徐俊西讲，他也很赞同。

当时专栏的名字也是很难起的，因为你要做一件事情，就要有一个最简单、最明确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纲领，就是一面旗帜。所以你必须找到一面旗帜，这个旗帜呢，我的想法是既要有一定的学术性，又要有一定的普及性，让人一看就能理解明白。所以开始呢，这个栏目不是叫“重写文学史”，是叫“重估文学”、“重

估文学史”，受到尼采的价值重估影响嘛。后来觉得“重估”不太好，因为“重估”总是觉得太拗口了，不够大众化、不够明确，后来又想到“重读经典”、“重读名著”等，但是又觉得不够激情，我这个人是很有点激情的，觉得口号一定要有点杀气，这几个名字杀气不够，也文绉绉的。“重读经典”、“重读名著”，不来劲。最后想，一定要有种翻个儿的感觉，所以“重”字是必需的，“重”等于要倒个儿，重什么呢？从我们开始重新写，就是这个比较明确嘛，好，就定下“重写文学史”了。

我们发现，毛时安关于上海“重写文学史”发生的叙述和陈思和、王晓明的叙述有很大的差异，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在毛时安的叙述中，完全没有提及北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青年学者创新座谈会”等内容，也就是说，他完全没有“北京-上海”这样一个学科发展延续的观念。第二，在他的叙述中，触发“重写文学史”的主要是意图是为了对现实的介入，产生社会轰动效应，而没有考虑到过多的学科建设方面的因素。第三，他认为触发“重写”动机的主要是存在主义思潮、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和苏联的“重评”运动，由此可见，“重写文学史”在毛时安看来，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激进）思潮裹挟下的产物，是当代社会思潮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种表现形式。需要说明的是，“重写文学史”在上海的提出实际上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不过，恰好有了《上海文论》这么一份刊物，有了那么几个人一起，才最终落实成了一个所谓的上海的“重写文学史”实践：

当时在上海的这群青年评论家当中呢，我是年纪最大，当时我们想做这件事情，我就跟徐俊西他们商量，就是说需要找到这样的人，一方面要有学院的背景，使这个栏目显得很学术，我们不是乱写文学史，我们是有科学依据的；另外就是要对现当代文学确实很熟悉，仅仅熟悉还不

行，因为有的很熟悉却没有思想，还要有思想；然后呢，还要年轻、有点冲击力；而且名气不能比我们还大、比徐俊西还大，那就没意思了，是不是？名气也不能太大。我们就是要找这样的人，最后呢，觉得陈思和、王晓明是纳入我们视野最合适的，因为他们两个人一来跟我们关系很好，都比我小嘛，然后呢，两个人做事情都很认真、很踏实，他们都是很学者的，对现当代文学也很熟悉的，是专业出身。比如晓明，既有家学，还有钱谷融先生的学术背景；最后，两个人文字都很好，我们觉得很合适。我把这个想法跟他们一说，他们觉得很来劲。所以我们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组合。⁵

《上海文论》是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一个刊物。主编是徐俊西。徐俊西当时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研究，思想比较开放，另外还有一个人，就是编辑部主任毛时安，实际的杂志是毛时安具体在编。然后就在那里讨论，说是想要办一个响亮点的栏目。徐俊西是复旦中文系的老师，陈思和是复旦中文系毕业的，所以他就找了陈思和。我跟陈思和是很好的朋友，我们当时都很年轻，都是大学里的青年教师，那个时候很多事情都一块做，所以找我们俩一块去。⁶

我记得有一天下午是在上海社科院《上海文论》编辑部的一个房间里，我们三个人，毛时安说要我和陈思和两个人来编一个关于文学的栏目，但是要想出一个具体的题目。大家讲啊讲啊讲，想不到好的题目。后来我说了一段话，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其实想做的就是想要一个重写文学史啊什么的，我说了一通，陈思和反应很快：“那就叫‘重写文学史’吧”，我说的时候是无心的，是他把这五个字拎了出来。他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好，就这么定下来了。⁷

虽然毛时安、王晓明、陈思和三人的叙述关于具体的历史细节有所出入，但是还是很容易看出“重写文学史”思潮的落实确实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并非如陈思和后来所言的那样“顺理成

章”。在我看来，这种叙述的差异来自于不同的身份意识，相对于陈思和、王晓明的研究者的身份，毛时安主要是一个批评家和编辑，90年代以后也一直没有进入大学的学术体制，因此，他的回忆更接近于一种未经学科规范“规训”的叙述，自然更少“学科色彩”。而陈思和、王晓明本来就是科班出生，后来又一直在高校从事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自然更容易从学科的角度来理解“重写文学史”。我之所以在这里把毛时安的叙述与陈、王等的叙述并置在一起，其实是为了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如果跳出学科史的角度，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可能就不仅仅是一个在时间上构成的线性递进的进程，而是一个可能是在不同的空间里面都开始酝酿发生的“历史思潮”，它一方面是80年代社会思潮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反馈，另外一方面也是一批文学知识分子借助这一形式来表达对现实社会的介入和建设。具体一点来说就是，北京和上海同属于“重写”发生的空间，虽然在时间上有先后（1985年和1988年），但是，这种时间上的先后并不构成一个严格的因果逻辑，并没有一个谁是因，谁是果的线性进化的顺序，而是可能平行构成“重写文学史”发生的起源。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提出这种可能性并不是为了完全颠覆陈思和、王晓明等人关于“重写文学史”学科史的叙述，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叙述是合理且合法的，只是在我看来，这种叙述带有一定的封闭性，不利于重新打开“重写文学史”的理解空间，所以才有必要导入“空间”的研究视野。

二

上海这一地理空间为“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和实践提供了何种文化氛围？诚然，《上海文论》杂志，徐俊西、陈思和、王晓明、毛时安等人的参与可能都是“重写文学史”落实的推介因素之一，但是，这些可能只是些很偶然的可选择因素，并直接受到该空间文化气质的

影响。从根本上说，上海的文化氛围和文化性格⁸必然和当时的整个社会文化思潮、意识形态构成错综复杂的关系，并直接影响到“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变化和发展。这其实是一个带有跨文化研究的大题目⁹，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并不适合也不需要进行全部的展开，只是作一些相对简单的梳理归纳。

对于1985年后的上海文化氛围，有很多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说法，在一次访谈中，李陀认为上海1985年后的文化氛围其实是比较宽松的，他把此原因归结为当时上海的一批文化人比如巴金、茹志娟、王西彦、李子云等观念比较新，对于新的文化现象都持一种开明保护的态度。¹⁰吴亮也认可这种观点，但却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的：“中国作协、中宣部都在那里（指北京，编者注），甚至当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有文艺版，都有文艺评论，他们都喜欢板着脸孔。《中国青年报》当时还比较开放一些，有些年轻人。上海当时没有这样一些中央级的大报，相对而言控制的比较松一些，是不是还有些其它个人原因，我不得而知，我也很少去关注这些问题，可能上海相对不是一个政治化的中心，而且当时整个的气氛就是鼓励文艺繁荣，鼓励文艺创作。”¹¹而在80年代的另外一位文化干将甘阳看来：“我们后来比较明白，就是上海比北京严得多，上海控制紧得多。”¹²这种对上海文化氛围截然不同的观点可能都带有个人经历的体验，并不能代表历史的真实状况，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这些80年代的当事人的言谈中，我们可以捕捉到另外一种更有价值的信息，那就是，在80年代，只有上海才拥有足够与北京相抗衡、制约和互补的政治文化资本。上海从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另外一种空间，这一空间既是北京的复制和补充，另外一方面也同时是它的拓展和变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的文化氛围究竟是“宽”还是“严”并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无论“宽”、“严”，80年代上海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文化空间，在此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紧密纠

缠在一起，并因此成为一系列文化事件“生产”和“加工”的温床。

上海的这种特殊的文化位置是经过长期的历史建构起来的。比如在30年代，上海是“左翼文学”的中心，代表了当时一种激进的、对官方意识形态形成解构和颠覆的文化力量。而在一些研究者看来，30年代的“新感觉派”文学不仅是“文学上的先锋”，同时也是“意识形态上的先锋”，也是具有某种解构的文化性质。¹³王晓明据此认为上海的文化性格具有某种“解构性”的特征，这是有一定道理的。¹⁴这里面其实有两条线索可以追溯下来，第一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精神传统，第二是上海的“市民”文化传统。我们分开来略作讨论。

首先讨论第一个，“五四”传统是80年代文化重建的主要思想资源之一，这一点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都是一致的。但是对于80年代的海学人来说，“五四”传统不仅是一个历史化的文化记忆，更是非常现实的具体所指，陈思和对此有非常清楚的体认：

复旦大学有几个关键性的老先生，这是非常难得的。贾植芳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我的一生碰到贾先生是我的一个转折点，是他让我知道是怎么做人的，……贾植芳先生对“五四”这种传统是非常认可的，如果现在我问你什么是“五四”，你可能搞不大清楚的，他们是很具体的，“五四”就是跟着胡风，胡风就是跟着鲁迅，鲁迅就是“五四”精神，他们的脑子里面这个线是很清楚的。¹⁵

从鲁迅开始，然后是胡风和巴金，再到后来的贾植芳、钱谷融等等，这是80年代上海文化学术的一个基本的传承，无论是陈思和、王晓明还是李 等都是认可并自觉参与到这样一个文化传承中去的¹⁶，这种文化传承在当代要么是被压抑和排斥（如胡风、贾植芳、钱谷融等），要么是遭到一定程度的“扭曲”和改写（如鲁迅和巴

金），因此，它们很容易在80年代的话语体系中找到并放大它的位置，通过“重写文学史”为这一文化传统“正名”同样是当时应对意识形态危机的一种方式。

其次，上海的特殊性还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精英文化”所塑造的空间，实际上，它强大的商业和市民文化传统也同样构成了它的独特性。在很长的时间里，上海的这种市民商业文化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比如陈思和显然没有意识到商业市民传统（它的文学形式就是通俗文学）会对他的文学史观念和学术实践产生什么重要的影响，但实际上他的学术研究却一度和通俗文学发生关系。¹⁷当然，这种联系也没有必要予以夸大，但是有一点需要指出，在1985年以后，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拉开，上海作为近代中国开埠最早的国际大都市，它潜在的市民观念和商业意识可能比其它地方更容易得到激发并予以回应，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很有限地讨论了1985年《上海文学》杂志与城市消费之间的关系，并认为正是这种观念推动了“新潮文学”在上海的发展，¹⁸程光炜在最近一篇讨论“先锋文学”的起源的文章中¹⁹也令人信服地指出：

正如作家王安忆描绘的，那时上海的生活景象是：“灯光将街市照成白昼，再有霓虹灯在其间穿行，光和色都是溅出来的”，“你看那红男绿女，就像水底的鱼一样，徜徉在夜晚的街市。他们进出于饭店，酒楼，咖啡座，保龄球馆，歌舞厅以及各种专卖店，或是在街头磁卡电话亭里谈笑风生”，这“才是海上繁华梦的开场。”（王安忆：《海上繁华梦》，引自《接近世纪初》，第53、54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而当时北京和大多数内地城市，各大商场夜晚7点钟前已经熄灯关门，很多地方还是“黑灯瞎火”的情形。某种程度上，城市的功能结构对这座城市的文学特征和生产方式有显著的影响。所以，无论从杂志、批评家还是作为现代大都市标志的生活氛围，上海在推动和培育“先锋小说”的区位优势上，要比其他城市处在更领先的位

置。这些简单材料让人知道,即使在1980年代,上海的文化特色仍然是西洋文化、市场文化与本土市民文化的复杂混合体,消费文化不仅构成这座城市的处世哲学和文化心理,也渗透到文学领域,使其具有了先锋性的历史面孔。

虽然上述两篇文章研究的对象都是集中在“先锋文学”与上海城市文化的关系方面(“先锋文学”、“新潮文学”与“重写文学史”其实关系甚大,这里暂且不表),但从中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出在城市改革的影响之下,文化行为和文化方式实际上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毛时安在谈及“重写文学史”栏目的时候就曾谈到“商业方面”的考虑,希望通过“重写文学史”栏目改变《上海文论》的面目,并求得经济上的效应。²⁰当然,我们并不能在这种商业意识和市民传统与“重写文学史”思潮之间建立一种必然的“因果联系”,如果是这样的话,则是把问题简单化了,也必然会贻笑大方吧。我想指出的是,上海的这种商业文化和市民传统更多的是一种背景性和文化上的参照系,在80年代,它与上述的以鲁迅、巴金、胡风、“新感觉派”等文化传统一起,在“思想解放”和“城市改革”的影响下,被重新予以“复制”和“激活”。罗威廉(William T Rowe)的研究曾指出这种“文化记忆”的效用:“我的全面研究表明,造成该县暴力泛滥历史除地理因素之外,还须归因于当地特殊的文化传统,它们能够系统地复制世代传承的大规模暴力行为倾向。这种文化传统表现在其他事物中,其中包括不断地撰写的地方志和其它文化记忆载体,如民间歌谣、传说、地方戏、诗歌、武术和民间宗教传统,还有各种历史遗迹与遗址。”²¹就80年代上海的“重写文学史”而言,无论是死去的鲁迅、还是蒙受“冤屈”的胡风、巴金,以及被冷落的“鸳鸯蝴蝶派”,这些“历史记忆”和“历史碎片”在80年代的上海空间里面被重新缝合、型构,它并不必然导致某一事件或者后果,但是,这种文化性格却始终以一

种边缘的身份与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形成一种“偏离”,以“异”的面目出现,刺激和活跃着上海的文化想象和文化参与方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上海的“重写文学史”在继承和发展前此的“重写”思潮的基础上,呈现出更加激进的“解构”姿态。

注释:

- 1 陈思和:《关于“重写文学史”》,《笔走龙蛇》,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7年版,第110-114页。
- 2 同上,第111-112页。
- 3 陈平原曾指出:“八十年代的学人,因急于影响社会进程,多少养成了‘借经术文饰其政论’的习惯。……换句话说,表面上在讨论学术问题,其实是在做政论,真正的意图在当代中国政治。这一方面体现了我们的现实关怀,但另一方面,也会导致专业研究中习惯性的曲解和挪用。”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陈平原》,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38-139页。
- 4 毛时安、杨庆祥:《〈上海文论〉和“重写文学史”——毛时安访谈录》,未刊。
- 5 同上。
- 6 王晓明、杨庆祥:《历史视野中的“重写文学史”——王晓明答杨庆祥问》,《南方文坛》,2009年第3期。
- 7 同上。
- 8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历史上关于上海的城市精神(文化性格)就有很多的讨论,比较著名的有两次:“一次是清末民初的讨论……将上海与北京、南京、天津、汉口等城市相比较,或批评上海崇洋、肤浅、奢靡,或赞扬勇于学习外国、文明,有创新精神。”“第二次讨论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这一次,既包括由沈从文等挑起的关于京派、海派的论争,也包括《新中华》杂志发起的讨论。……这次讨论,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上海城市精神比较有启发意义的是两个人的意见,一个是哲学家李石岑,他将上海与苏州、南京、北平相比,认为上海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城市,能够抓住时代发展核心,生活紧张,能锻炼人的能力。……另一个是留学法国、日后成为北京大学教授的曾觉之的意见。他从不同文化的并存、融合和新文化的产生的角度,认为上海这一特殊的城市,将成为新文明的中心之一。”见熊月之、周武主编:《海纳百川——上海城市精神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36页。

- 9 近年来,对上海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空间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相关著作繁多,比如研究上海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的著作有: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李今的《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杜心源的《城市中的现代想象》(上海: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07年版);陈惠芬的《想象上海的N种方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研究上海的文化性格的有:杨东平的《城市季风》(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熊月之、周武主编的《海纳百川——上海城市精神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
- 10 李陀与笔者在2008年的一次谈话中谈到这一问题。
- 11 吴亮、李陀、杨庆祥:《80年代的先锋文学和先锋批评》,《南方文坛》,2008年第6期。
- 12 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甘阳》,第224页。
- 13 参见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何恬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 14 王晓明、杨庆祥:《历史视野中的“重写文学史”——王晓明答杨庆祥问》,《南方文坛》,2009年第3期。
- 15 陈思和、杨庆祥:《知识分子精神与“重写文学史”——陈思和访谈录》,《当代文坛》,2009年第5期。
- 16 王晓明、杨庆祥:《历史视野中的“重写文学史”——王晓明答杨庆祥问》。
- 17 陈思和在访谈中说:“《巴金论稿》写完以后接着要写毕业论文嘛,我就想换个题目,最早想研究的‘鸳鸯蝴蝶派’这块,研究通俗文学,为什么呢,我当时认识一位老先生,是研究旧文学,我受了他一点影响,后来看看,发现我也不大喜欢这方面,就放弃了。”参见陈思和、杨庆祥:《知识分子精神与“重写文学史”——陈思和访谈录》。
- 18 杨庆祥:《“读者”与“新小说”之发生——以〈上海文学〉1985年为中心》,《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4期。
- 19 程光炜:《如何理解先锋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2期。
- 20 毛时安说:“但是,光改版还是不行,必须内容上有变化,我第一个讲改版,第二个就是要讲经济。那个时候刊物发行量小嘛,只有两三千份,经济上一直没办法运作,所以我们当时我们搞了很多企业的报告文学,通过报告文学来赞助,出版报告文学来养《上海文论》,就是这么运作的。”毛时安、杨庆祥:《〈上海文论〉和“重写文学史”——毛时安访谈录》。
- 21 罗威廉(william T Rowe):《清代东山民变:乡村暴力的传奇》,沈宇斌译。收入王笛主编:《时间·空间·书写》,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书城》杂志6月号、7月号要目:

- | | |
|-------------------------|-------------------------|
| 薛涌:白银帝国的崛起 | 毛尖:巴黎完了 |
| 吴亮:慵懒的爱情 | 周念迥:如何浪漫,怎样肖邦? |
| 陈占彪:屠坤华和他的《一九一五万国博览会游记》 | 王晓明:胡志明市大街上的摩托车 |
| 郜元宝:一例氩氦入诗囊 | 孙英刚:朝河贯一和“中世日本”的构建 |
| 博思源:李济何以成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 薛涌:白银帝国的架构 |
| 罗四鸽:大丈夫、小偷与间谍 | 吴亮:天空之下 |
| 马慧元:听图雷克,漫想巴赫 | 顾铮:《感动年代》的台湾影像 |
| 苏晓琴:失家园 | 赵川:身体剧场 |
| 王威廉:远方之间:从“看”到“见”的距离 | 范伯群:从劫后余生的“紫罗兰”亲笔信看…… |
| | 陈智超:从《陈垣来往书信集》谈书信的价值与利用 |
| | 卢盛舟:卡夫卡的异地恋病理学 |

邮发代号 4-516

《书城》杂志社出版